

中外名人傳

(二十五)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七十一頁)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劉香谷(一九〇一—一九九七)

網球國手

國立雲南大學教授

雲南雲嶺中小學創辦人

國民大會代表

女子網球國手、國民大會代表劉香谷，

原名劉玉蘭，一九一〇年三月廿二日生於山東臨淄，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因先天腦內血管異變，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八歲。

她的父親劉殿華，為護國先烈，因參加革命化名劉維華，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四月八日，因討伐袁世凱壯烈成仁，神位奉厝於台北市圓山忠烈祠，得年二十八歲。母親蘇氏，哥哥劉秉信，弟弟劉秉誠。

香谷在父親逝世時年僅四歲，六歲進小學，十三歲入青州崇德女子中學，十六歲考上山東曲阜第二師範學校，畢業時正逢國立中央大學函請各省教育廳選送體育成績優秀

學生入學，於是被保送進入中央大學體育系，同班的同學有名體育家周鶴鳴、俞晉祥、龔家鹿、田漢祥、劉廣信、楊永燦等。因為劉香谷特愛網球運動，曾屢獲南京各大學女子網球錦標賽及江南八大學女子網球賽冠軍。並當選為一九三四年馬尼拉第十屆遠東運動會中華民國代表隊國手。

一九五八年她已四十八歲，仍當選為國手，參加東京第三屆亞洲運動會，奪得單打和雙打兩面銅牌。一九六〇年又擔任中華民國參加羅馬奧運代表團女子隊管理，率領中國田徑女傑紀政，首次參加奧運會。此後三十餘年她常單槍匹馬，在香港、新加坡、印尼及美國各州參加分齡錦標賽，幾乎所戰皆捷，奪得錦標無數，被體育界譽為「中國體壇的長青樹」。

一九三四年自中央大學畢業後和雲南籍的陶鎔(貫成)結婚。後來政府派陶鎔任中國駐英大使館陸軍少校武官，她隨同赴英，並進入倫敦卑禾學院(Bedford College of

London University) 研究教育。駐英四年每年暑假期間均隨陶鎔赴歐洲各國考察教育與體育，沿途與各國女子網球好手，作友誼比賽，切磋球藝，聯絡感情，廣交朋友。

一九三八年九月隨陶鎔回國參加對日抗戰，陶鎔任昆明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五分校第十六期學生獨立大隊中校總隊長，香谷則應聘為國立雲南大學教育系教授，並出任雲南省婦女福利協會理事長，更自行創辦雲南省雲嶺中小學。

一九三九年陶鎔升任軍訓處上校副處長，陸軍總司令部上校高級參謀等職，又隨赴重慶。後因陶鎔奉派為三民主義青年團雲南支團籌備處幹事兼書記，她又隨同到雲南兼任昆明市及雲南婦女會理事。

一九四〇年九月陶鎔調任重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警衛旅政治部上校主任，一九四五年六月又奉派為陸軍總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她均伴隨參與抗日工作。

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獲得最後勝利，陶

銻出任雲南省政府委員、省訓團教育長及三民主義青年團雲南支團部主任，劉香谷也隨同到昆明。一九四八年陶銻當選雲南南區立法委員，從此與民意代表問政生涯結緣。

來台以後，劉香谷任國民大會代表，並多次出任國大代表全聯會常務幹事。因陶銻長年為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集委員，與各國友人接觸機會甚多，劉香谷也藉此發揮體育外交長才，以球會友，在東南亞各國參加高齡網球賽，屢獲勝利，甚至越級挑戰，也攻無不克。

一九八〇年起更遠征美國，參加美國網球協會主辦七十歲、七十五歲等組各項冠軍，並獲得美國網球協會終身成就獎的特別表揚。我國外交及僑務單位，深感她廣結善緣，為國爭光，特聘她為僑務委員，以強化其影響力。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陶銻因患惡性腫瘤逝世，劉香谷心情不佳，於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中風，送到醫院急救發現為先天腦內血管異變，此症應早在二十多歲時發病，由於她經常運動打網球，增加了抵抗力，故到六十多年後才因心煩病發，經開腦手術取出血塊，但神經受損，從此行動不便，多次出入醫院，至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與世長辭。

獨子陶士興遊學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在籃球場上十分活躍，回國後協助父親加強推展印度、緬甸及斯里蘭卡的文化經濟交流。

此外又籌辦職業籃球賽，一九八八年曾以執行長身分，協助德國經濟辦事處，舉辦破紀錄的「為明日美好環境而跑」萬人路跑活動，及四十五場「環保」和「大眾捷運」科技研討會。現任中印緬錫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實際協助政府推展國民外交。媳婦徐西妮為中國文化大學高材生，服務教育界，孫子陶其聖小學六年級，聰明伶俐，活潑可愛。

劉香谷為人直爽，有強烈的好勝心，也樂於助人，對於提倡體育，鼓勵年輕選手上進，為國爭光，竭盡所能，曾擔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現改名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理事多年，為我國體育界知名的典型人物。（龔祖遂撰）

周靈鈞（一九〇九—一九九七）

浙江奉化縣縣長

浙江第二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

國防部總政戰部中將副主任

聯勤總部政戰部中將主任

周靈鈞一九〇九年生，祖籍安徽來安，耕讀傳家，不幸幼失怙恃，賴姑母茹苦含辛，撫育成長，及啓蒙就學，聰穎好讀，後過繼已逝之族叔為子，由繼母供給學費，民十五年秋，負笈南京安徽中學，二十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高中部，同年考取中央政治學校（國立政治大學前身）第四期行政系，民二

十四年畢業，派赴浙江省蘭谿縣實習，並留縣任職，因工作認真、卓著成效，所負責之鄉鎮自治、保甲戶口、食儲積谷、社會救濟、衛生行政、徵兵徵糧等業務興替極多；歷任蘭谿縣民政科主任、科長等職，極為上級所倚重。

民二十六年，抗戰軍興，隨戰事情況進展，二十七年春，供職湖南省民政廳第二科，主辦縣政人員訓練，編組保甲與清查戶口等事宜，極為良好，同年秋，奉命任四川省省政府視察及助理秘書等職，極著功績，政校同學中譽為「民政三傑」之一，民二十八年三月，蔣經國出任江西贛南第四區行政專員，亟需曾任基層民教財經經驗人員輔助，經政校同學會，遴選推薦周靈鈞與黃密同學前往任職。

周氏在贛州初任專員辦公室助理秘書，後升主任秘書多年。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周靈鈞奉命任浙江省政府設計委員後轉任為奉化縣縣長，奉化為蔣中正總統故鄉，因姻親鄉黨等關係糾葛，素稱難治；周靈鈞自到任之後，依次整頓治安，賦稅及民、財、建、教各項政務，百廢俱興，里無煩言，群情欽服，由於政績優異，後調升第二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勤政親民，政通人和之成效大著。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十月任蔣中正總裁辦公室秘書，後轉任軍職，初任總政戰部辦公室少將主任，民國四十三年任總部中

將副主任，對建立政工制度，創辦政戰學校，多由其規劃實施，貢獻卓著；民國四十九年調聯勤總部政戰部主任。

民國五十三年，奉命專任戰地政務工作，擔任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兼主任秘書，研整方案，擊劃經營，儲訓省級以上高級幹部逾數萬人，奠定戰地政務工作之根基。於民國五十八年限齡退伍。

民國六十二年元月轉任黨部大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協助建立人事、安全、經費管理等等制度，表現卓越，七十年自黨部榮退。

周靈鈞一生，幼時孤苦，唯能淬礪奮發，以優異成績完成高等教育，其後因職務需要，在大陸時參加廬山訓練團受訓，來台後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與國防研究院等高級學府深造，成績優良，因工作上之貢獻，曾獲頒四等雲麾、忠勤等勳獎章多座。

民國二十五年，在蘭谿迎娶蕭明女士為妻，婚後夫唱婦隨，蕭明持家克勤、克儉、守正守份誠可稱賢內助；育有三子一女、長子周中習機械，獲美耶魯大學哲學博士，現在美大專任教，次子周正（改名正之），陸軍官校三十二期及美加州大學企管碩士，現任陸軍總部後勤司令部中將司令，三子周元習水利，在美獲工程管理碩士，現供職底特律市政府，女周平在美獲傳播及圖書館管理雙碩士學位，現服務美國國會圖書館，足見周靈鈞夫婦教子有方，長綿世澤。

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十二日周氏因肝臟衰

竭逝世，享年八十有八歲。（王雲卿撰）

林蔚（一八八九—一九五五）

精通軍事參謀業務

陸軍二級上將林蔚，字蔚文，浙江黃岩人，一八八九年生，早歲在家鄉讀書，中學畢業後，考入江南水師學堂工程科，畢業後，未當上海軍，反而進入浙軍服役，成了陸軍。後來考進陸軍大學正規班第四期，正式棄海上陸。陸大畢業後，仍回浙軍，擔任工兵營營長，不久升任參謀處長及第四團團長。林蔚的軍事學歷，在當時的軍隊裡可說鳳毛麟角，陸海軍正規的軍事訓練，使他成為浙軍軍官中的佼佼者。

一九二四年，孫傳芳督率華東五省時，浙軍改編為三個師，第一師師長陳儀，為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嫻熟現代戰略戰術，軍事理論的修養極高，林蔚身為陳儀部屬，浙江同鄉，又是中國大陸大畢業，同氣相求，很受陳儀的重視。一九二六年，經陳儀多次保荐，林蔚升任浙軍第一師參謀長。同年十月，北伐軍所向無敵，勢如破竹，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由徐州率師南下進入浙江省境，奉孫傳芳之命抵禦北伐軍，但陳儀卻與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暗通聲氣，秘密接受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的任命，事跡早泄，陳儀被孫傳芳逮捕，羈押在南京。林蔚協助副軍長石鐸

率第十九軍在寧波紹興一帶與孫軍作戰，孤立無援，被孫傳芳大軍圍困，幾乎被消滅。次年二月，北伐軍擊潰孫軍，光復浙江全境，第十九軍團人數過少，縮編為第十九師，由第六軍節制，林蔚調到第十七軍任參謀長，該軍為閩軍，是由福建李培基軍改編而成，軍長曹萬順，是個舊式軍頭，幹部山頭林立，互相排斥。林蔚是外來人，極易遭到排斥，但他個性溫和，待人隨和，嫻熟參謀業務，精通軍事理論，竟頗受歡迎，軍參謀長做得有聲有色。

一九二八年春天，奉軍張作霖退出山海關，北伐結束，全國表面上完成統一。這年五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一個警備司令部，作為軍隊中的精銳，蔣中正總司令選拔警備部隊幹部，以黃埔軍校出身、浙江人，陸大畢業為最高標準，任命陳誠為警備司令，其所屬師團長也以這個標準選拔，林蔚合此條件，受到陳誠的青睞，被任命第一師參謀長，不久，調為警備司令部參謀處副處長，負責策劃對張作霖作戰。

同年六月，警備司令部和十七軍縮編為第十一師，由原十七軍軍長曹萬順任師長，陳誠為副師長。翌年五月，曹萬順去職，陳誠繼任師長，任林蔚為所屬的旅長，但他並未到任，因為國民革命軍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林蔚調升總司令部參謀廳廳長。

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林蔚以參謀廳長的身分隨蔣中正親臨前線作戰，從此變成

蔣氏身邊的貼身幕僚。是年十月，中原大戰結束，閻馮聯軍潰敗，林蔚負責改編戰後的西北軍，圓滿達成任務。戰後擔任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

一九三三年，蔣中正親自率軍圍剿盤據在江西瑞金山區之中共紅軍，林蔚協助策劃，集中重兵翦除「福建人民政府」，使中共紅軍佔領區大幅縮減。

一九三五年三月，軍事委員會設置銓敘廳，掌管陸海空軍人事，林蔚出任首任廳長，負責三軍軍官任用，權位甚重。同年四月，三軍部隊開始授給軍銜，各派系你爭我奪，林蔚以大公無私的精神，兼顧各派系的權益，使授階工作進行順利，獲委員長蔣介石嘉勉。

胸襟開闊儒將派頭

林蔚最大的長處是胸襟開闊，沒有門戶之見，不講同鄉或同學關係，對長官忠誠，對部下誠懇。例如一直跟在他身邊的助手錢卓倫是江蘇人，機要科長徐世江是遼寧人，隨身副官陳文華是非親非故的廣西人，他從不培植自己的派系，一心一意為國家、為領袖服務。

自中原大戰之後，林蔚就成了蔣中正手上一的一張牌，那裡吃緊就派到那裡去。不過，每次派遣的任務，總是副官或參謀長，換言之，就是「管家婆」，很少當威風八面的主管官。儘管如此，他從無怨言，博得軍中

「老好人」的稱號。他擔任過的「管家婆」任務，計有一九三〇年他隨何應欽任廣州行營參謀長，一九三七年他隨徐永昌任石家莊行營參謀長。一九三九年，他隨白崇禧任桂林行營參謀長。一九四〇年，他隨李濟琛任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副主任。這些主管都明知他是蔣介石的心腹，但由於他態度溫和，貌似學者，一副儒將派頭；喜怒而不形於色，很少見其發怒，即使在激烈的會議爭執時，他亦輕言細語，委婉而不離其宗，言辭動聽而不失態；預留後路，常能因緣附會，水到渠成。所以，他的主官和其周圍的人與他共事，對他的為人沒有什麼異議，相處得很好。一九四六年六月，軍事委員會改組成立國防部，林蔚被任命為國防部次長，協調白崇禧與陳誠之間的矛盾。

林蔚也結交國民黨浙籍將領胡宗南、湯恩伯等人，並靠近陳誠，陳誠也通過林蔚和蔣中正溝通，兩人互相信賴、支持和合作。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陳誠代何應欽取得軍政部長地位時，他就任陳誠屬下的政務次長，成為陳的得力助手。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和陳誠按照美國顧問團的旨意，改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國防部新機構，為陳誠盡了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戰烽火燃起，日軍在華北伸展侵略勢力，軍委會為統一華北指揮作戰，成立石家莊行營，林蔚任參謀長。同年八月，抗敵部隊

陸續到達前線的有：第二集團軍劉峙部，第十四集團軍衛立煌部、第二十集團軍商震部和萬福麟第五十三軍。平漢線上的中國軍隊雖多，但由於準備不夠，行營主任徐永昌指揮乏術，部隊協調不足，紀律鬆弛，高級指揮官怕擔過錯，得過且過，林蔚對此亦束手無策，部隊潰敗沿平漢路和正太路向河南、山西撤退。十月十日，石家莊淪陷，石家莊行營撤銷。

一九三九年初，林蔚接楊杰任軍部次長。同年五月，桂林行營成立，白崇禧任主任，林蔚任軍令部次長兼行營參謀長。這年十一月月中旬，日軍第五師團與台灣旅團借海空軍掩護，由欽州灣龍門港登陸，南寧、昆侖關失陷。林蔚協助白崇禧，指揮第四戰區於昆侖關、高峰隘以北占領陣地。北路軍徐庭瑤為總指揮，指揮杜聿明等部主攻昆侖關；西路軍夏威部助攻高峰隘；東路軍蔡廷鍇部截斷敵後方交通。林蔚與白崇禧分別赴前方親臨指揮，於十二月卅一日收復昆侖關。一九四〇年一月，日軍由廣州抽調部隊增援桂南，白崇禧、林蔚指揮部隊阻止、消耗正面敵人，再圍殲迂迴之敵。可惜第二軍在東路主力未及時到，以致被日軍擊破，賓陽失守，林蔚乃以第十二集團軍猛攻廣州，迫敵退守廉欽路，結束會戰。

與史迪威協調作戰

一九四〇年九月，日軍入侵越南，並和

泰國簽訂友好條約，而後揮軍南下，威脅英國殖民地馬來半島、新加坡及緬甸。英國開始轉變對中國的態度，表示要和中國簽訂同盟條約，共同商訂保全緬甸的具體計畫。一九四一年一月，國民政府成立「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林蔚任副團長（團長為商震），率考察團於同年二月出發，到緬甸、印度、馬來西亞考察約三個月之久，搜集有關緬、印、馬經濟、政治、軍事資料，編成「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報告書」，全書計三十三萬言。這次考察，為日後中國遠征軍出征緬印打下了基礎，也為他出任參謀團團長作了準備。

一九四一年六月至十二月，應英國方面的要求，中國在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方面作了必要的準備，其中主要的是成立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林蔚被任命為團長，負責策劃中英有關作戰的一切業務。

這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中國組成遠征軍第一路軍，入緬甸會同英軍、美軍共同抗日，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親至緬甸的臘戍，會晤英軍總司令魏菲爾，林蔚隨行。不久，中國遠征軍成立司令部入緬指揮作戰，指揮官為蔣中正，美軍中將史迪威為參謀長，林蔚奉派為參謀團團長，負責與史迪威協調作戰。由於史迪威剛愎自用。不聽別人意見，經常和總指揮蔣中正鬧彆扭，以致身為聯絡參謀的林蔚，如同夾心餅乾，左右

不是人。一九四二年四月廿九日，日軍攻陷臘戍，林蔚率參謀團退守雲南省的保山，行程一千餘里，沿途穿越黑森林，與自然環境奮鬥，許多官兵病死、餓死，使林蔚十分痛心。

一九四二年六月，林蔚率參謀團再返昆明，整訓遠征軍，並報由軍委會批准成立「戰時滇西幹部訓練團」，由宋希濂任訓練團主任，撤銷了參謀團。是年十一月，林蔚以軍令次長的身分會同史迪威策劃反攻緬甸。由孫立人部打出仁安羌大捷，揚名世界。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林蔚又隨蔣中正前往參加。

蔣中正身邊的紅人

林蔚兩度擔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被外界視為蔣中正身邊的紅人。侍從室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全國黨政軍、財政、文教等方面重大的決策匯報和高級軍政人事調動紀錄，摘錄各部會廳處的重要簽呈內容，還有轉發各戰區的重要命令和文件，處理有關國際以及盟國的重要函電；需蔣中正親自批示的機密文件和蔣的手令等，均須經過侍從室的整理、擬辦然後發布和下達。可見其地位的重要。

林蔚第一次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他長於謀劃，偏重戰區的作戰規劃。關於文書和一般參謀業務的處理，則由他的助手、浙江黃岩同鄉于達負責。

在抗日各戰場處處吃緊的情況下，林蔚的謀劃專長正是蔣中正所需要的。所以，一九三九年四月，他調任桂林行營參謀長，於一九四〇年改任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副主任；一九四三年又調回侍從室，第二次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副主任。此時，正是抗日戰爭最緊張的時候，蔣中正竭力拉攏美國，希圖取得援助。林蔚亦極力協調同美軍駐華人員的關係，希望得到更多的美援物資。

林蔚跟蔣中正多年，對蔣的個性摸得很清楚。蔣中正最忌自己的屬下有私人，自成系統，形成小集團，林蔚非常明白自己的身分，因而他為人外柔內剛、貌善心慈、不喜交遊、很少應酬、從不請客、對朋友的求助也會適可而止。這樣，他的工作、生活作風在蔣中正的看來是無所貪求、無所爭、無派系、絕對服從、竭誠盡忠的得力助手。

林蔚在侍從室，對蔣中正的公私生活也安排的很得體。蔣的臥室他從不讓人隨便進入，除宋美齡和照料他生活的貼身衛士外，能進入他臥室的只有林蔚和陳布雷，林蔚甚至可以進入臥室，向躺在床上的蔣中正匯報請示。

由於林蔚同蔣中正關係密切，因而他在蔣的家眷親信中以及蔣的侍衛人員中威信很高，成了「官邸派」的首領，連蔣經國、蔣緯國有事相求其父時，都要先找「林叔叔」通通氣；那些高級將領們遇上不利之事時，

也都先求助於林主任，讓他先把個點，或者從中先消消蔣的火氣，為他們開脫一、二。一九四八年八月，陳誠從東北戰敗回到京，不敢馬上去見蔣介石，借口胃病復發，請假小休，暗地請林蔚先探風聲。時蔣介石因東北大敗，大發雷霆，經林蔚再三勸慰，氣消許多後，林才通知陳誠去見蔣介石，蔣把陳訓了一通了事。

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依銓敘應規定，均兼任軍事統計局局長，俗稱「特務頭子」，但林蔚雖兼局長，對局務卻概不干涉，任由副局長戴笠操盤，經管一切。只在每年的四月一日，軍統局成立紀念日時，他才去軍統局，講講話、聚聚餐。以致軍統局的成員只知道戴老板，不知還有個更高的局長林蔚。

一九四四年二月，林蔚調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八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他協助中央政府接受日軍投降，整編軍隊。抗戰勝利後，各廳處主管一律頒發忠勤勳章，但林蔚在批閱時，把自己的名子劃去。

一九四六年一月，民主同盟等黨派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提出「軍隊國家化」的提案。二月，林蔚奉命召集軍政、軍令等有關部門組成整軍計劃小組，負責有計劃地整編復員及編餘軍官。軍事委員會辦公廳、軍令部、軍訓部都有代表參加。

整軍計劃小組成立後，林蔚遵照蔣中正的指示，計劃於一九四六年裁兵三分之一，把軍改爲師，師改爲旅，旅轄兩團。他將整

編過的師分布於國防各要點或鐵路、公路線上；並將編餘的軍官集中起來。重新訓練後分配到各軍管區，並在當地大量征兵，重組國防軍。

一九四六年三月，何應欽召集白崇禧、陳誠、張治中、朱紹良、林蔚、劉斐、周至柔等高級將領，討論國民黨中央軍事機構改革問題，決定仿效美國，採用美軍司令魏德邁的建議案，改軍事委員會爲國防部。經過一段時間的權衡，國防部於六月一日正式成立，白崇禧爲國防部長，陳誠爲參謀總長，林蔚任國防部第一次長。

國防部的組成，按照美國軍事代表團所提方案建制，最高統帥權屬於總統，爲陸海空軍大元帥，參謀總長是總統的幕僚長，國防部長是政府機構的首長。

調和鼎鼐功在國家

早在一九三九年，中國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總裁。這次總裁選舉有一段小插曲，即投票結果，陳果夫得票竟比蔣介石票多，這個結果使林蔚大吃一驚，趕快找來陳立夫和陳誠各補投蔣一票，才解決了問題。

一九四八年春，國民政府頒佈憲法，推行憲政，正副總統採民主選舉，總統由蔣介石篤定當選，副總統則相持不下，有孫科、李宗仁、程潛、于右任等人力爭，蔣介石屬意孫科，林蔚會暗中協助拉票，不料仍由李

宗仁勝選，種下政爭的因子。

這年七月，中共在東北大舉進攻，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連吃敗仗，蔣介石調陳誠到東北接替熊式輝，由於敗局業已形成，陳誠也無力回天，林蔚十分失望。

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月上旬，蔣介石在南京召集了一次重要、全面的軍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國防部所屬參謀總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和聯勤總司令部主要長官，及全國各剿共總司令官等，林蔚作爲參謀次長出席了會議。蔣介石在會上對戰場的失敗作了檢討。何應欽和白崇禧除檢討外，對陳誠大肆攻擊。作爲敗軍之將，陳誠成了眾矢之的，林蔚愛莫能助。

同年秋初，徐蚌會戰展開，共軍出動二野、三野部隊二百餘萬人，把徐州地區的國軍團圍住，參謀本部決定把華中剿總所屬的由第十、第十八軍陳誠嫡系所組成的第十二兵團調往徐州，但華中剿總的司令官白崇禧不同意，由林蔚勸解，費盡唇舌，把司令官由胡璉換成黃維，白崇禧才同意調動，但爲時已晚，十二月初，黃維兵團被圍於徐州南郊，全軍覆沒，徐蚌會戰失敗。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國軍在剿共各戰場上節節潰敗，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失望自殺身亡，蔣介石在內外交迫中下野，林蔚也有自殺的念頭，他在同宋希濂談到對前途的展望時，搖頭嘆息地說：「國民黨幾百萬軍隊，都是二十多年積蓄起來的精華，現在幾乎

被共產黨完全殲滅了，局勢敗壞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挽救？共產黨提出的和談條件，實際上就是叫我們投降，有什麼和談可言？我自當幕僚以來，很少攜帶手槍，現在我把手槍隨時佩帶在身，準備萬一被共軍抓住，我就了結了自己……」

不過，蔣介石在下野前，安排陳誠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警備司令，作為復出的基地，並暗示林蔚今後將捲土重來，於是他又開始活動，折衝於李宗仁、何應欽及閻錫山之間，並要李彌、湯堯等將領，收拾在雲南的部隊，建立反共基地。

一九四九年四月，由一九四七年自台灣省主席調為浙江省主席的陳儀醞釀反對蔣介石，為湯恩伯發覺逮捕，年底轉往台灣基隆關押，後來被判死刑，林蔚和陳儀的關係很深，但他並沒有代陳儀向蔣介石說情。一九五〇年二月，林蔚出任東南長官公署副長官，作陳誠的副手。同年五月，改任總統府戰略顧問，晉任陸軍二級上將。一九五二年，又銜命飛往越南，和法國協商撤退至越境富國島的國軍留越部隊。

林蔚沒有子女，但夫婦感情彌篤。平日生活儉樸，沒有房產，存款也不多。工作謹慎，住址也保密，連最親近的參謀也沒有去過他的住所，送禮收禮，更沒有過一次。當有緊急公事須他親批時，也不讓參謀送去，而是在電話裡指示如何辦，由他人代為簽署，蓋上他的印章送出。

林蔚於一九五三年染病，一九五五年去世，蔣中正曾親往致唁，並明令褒揚。（王慰慈撰）

王星舟（一九〇二—一九九〇）

寧夏省教育廳長

國民大會代表

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

中國社會教育社理事長

著名的社會教育專家王星舟，原名王鍾文，字月帆，遼寧海城人，一九〇二年正月初三日生於海城縣第八鄉果子園。他的祖父王鎮山有貿易長才，經商致富，家財萬貫。父親王松圃則棄商讀書，精研法學，曾任龍江地方審判廳推事，辦案公正廉明，鄉里推崇。在父親寵愛下，王星舟自幼生活優裕，學業順遂。

雖然生活富裕，但王星舟讀書勤奮，在父親督促下，勵志求學，除隨父親誦讀外，並入學校就讀，過程順利，在故鄉完成中學教育後，於一九二〇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繼承父志，研讀法學，課餘廣讀書本雜誌，吸收時代新知，遂有報國救民之志，而於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立志獻身革命，以學生身分膺選北京市第一區黨部委員。一九二四年四月，國父孫中山應邀北上，四月十日發表北上宣言，揭發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同年十二月四日

，孫中山由日本抵達天津，王星舟代表國立北京大學學生同志赴天津碼頭迎接，並蒙孫中山接見垂詢，引為無上的光榮。

次年春，孫中山病逝北京協和醫院，王星舟和北大學生代表同聲致哀，至為悲戚。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北京各大學發動各校大中學校學生萬餘人在街頭遊行抗議，王星舟被推為學生聯合總會對外代表兼總務部主任，表現出不凡的談話能力及處事技巧，博得同學讚佩。

是年夏，王星舟自北大畢業，獻身黨務。一九二六年春，擔任「三一八慘案」昭雪會總幹事，為滄雪國恥進行抗爭。事後赴廣州，加入革命陣營。不久，回到北京，代理私立大中學校校長。是年七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王星舟從軍，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秘書處長，隨軍作戰。不久調升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任內鼓舞軍心，激勵戰志，立下殊勳。

北伐成功後，全國統一，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國國民黨在南京丁家橋設立中央黨部，並在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決定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組織部、宣傳部及訓練部，王星舟被任命為訓練部民眾訓練科主任，不久民眾訓練科改為民眾訓練處，第一位處長由馬超俊出任，王星舟擔任該處第三課課長，嗣後馬超俊調升中央訓練部秘書，經中央選拔並由中常會通過王星舟繼任為主任，擔負起全國民眾黨員訓練的重要

任務。

一九二八年東北張學良歸附中央，改懸青天白日旗，國民政府指派吳鐵城代表蔣介石委員長赴東北宣慰，協調召開東北三省國民會議，選舉首任代表，王星舟被選為黨務秘書，隨吳鐵城赴東北，羈留東北三月，各方協商，圓滿達成任務，奠定國民黨在東北發展的基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寇侵華野心畢露，為凝聚抗日力量，加強各省戰力，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王星舟膺選為吉林省代表，會中多所建言。一九三四年中央調王星舟轉任河南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在職長達四年，率領工作同志整理全省黨籍，建立黨員資料，並把圖書、文物作有系統的整理，予以建立卡片和檔案，分門別類，建立管理制度，使黨務推展邁入制度化、科學化。另外他召集各縣市黨務負責幹部在省黨部工作訓練，齊一步驟，交流經驗。共辦了兩期，很有成效。一九三六年，國民黨又在南京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王星舟當選河南省代表，出席全國代表大會。

第五屆全代會後，組織部部長張厲生調王星舟為組織部主任秘書，遂留在南京工作。次年，南京陷入日寇之手，王星舟隨政府播遷重慶，一九四〇年中央訓練團成立，培訓抗戰建國幹部，王星舟被派為教育委員會教務組組長兼訓育指導員，為培植抗戰幹才而努力。一九四一年調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

司長，但仍兼任中央訓練團教育人員及社會行政人員訓練班講師，又在中央政治學校高等科兼課，講授社會學科，傳授社會教育理論及實務，很受學生歡迎。次年夏，奉調為寧夏教育廳廳長兼省立寧夏中學校長，當時寧夏省仍在日寇戰火威脅之下，王星舟悉力以赴，使戰地青年有受教的機會，絃歌不輟。次年，他當選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監察會監察。不久，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日寇投降，東北光復，王星舟奉派任東北黨務特派員，不久，東北地區黨務組織改制，他改任東北黨務指導委員兼書記長，負責佈建東北黨務活動。翌年秋，國民政府決定還政於民，制訂憲法，推行憲政，王星舟當選遼寧區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赴南京開會，會同其他各省代表制訂了中華民國憲法，開始推行民主憲政。次年，他又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一九四九年，中共竊佔大陸，王星舟隨政府撤退來台，次年，中國國民黨厲行改造，王星舟出任改造委員會第一組副主任兼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改造工作完成後，又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五二年台灣省立行政專校改制為法商學院，王星舟兼任台北分部社會教育科主任。一九五五年由教育部長張其昀派往日本，考察日本社會教育概況，作為台灣推行社會教育的參考。翌年代理教育

部常務次長，一九五七年調離教育部，出任黨營事業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同時連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直到一九三七年。以後專任國大代表，兼任國代主席團主席，並應聘為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和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委員，對於推行民主憲政，鞏固國家法統，造福民眾，多所貢獻。此外，自一九五七年起連任中國社會教育社理事長達三十三年，直到一九九〇年逝世為止，對於社會教育的改革和推動，留下輝煌的貢獻。

王星舟以一東北青年，流寓關內，盡己之力，報效國家。對日抗戰期間，他在重慶組織老東北四省抗敵協會，結合在重慶的東北俊傑馬愚忱、吳煥章、馬亮、劉不同、王寒生等人，號召同鄉，團結一致，抗日赴敵。他們刊行抗建月刊，宣揚抗日目標，組訓青年，派赴敵後打游擊，與敵寇週旋。抗戰勝利後，蘇俄扶植中共在東北擴大內戰，王星舟領導東北六團體多次會見美國調停使馬歇爾，供給蘇俄對東北的陰謀資料。又招待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包括中共代表在內，向他們陳述東北接收問題，並反映東北民意，又向中外記者闡明東北人民的意願，表達東北人的心聲。

一九四八年，工礦部代表張華夫等七人奉派接收撫順工礦區，遭俄軍掩護下的中共紅軍殺害，釀成慘酷的血案，王星舟在瀋陽等地發動自由區的人民萬餘人大遊行，抗議蘇俄及中共陰謀，並由王大任、鄭輔周兩人

撰寫宣言，刊諸報端，昭告中外，申明東北接收受阻的實現，這些活動均由王星舟策劃領導。而他於抗戰勝利後還鄉主持黨務，在東北調和軍政、主持民運，在剿共與行憲兩大任務兼籌並顧之際，運籌帷幄，艱苦支撐，終能達成任務，表現他這不平凡的魄力和良好的操守。（路國華撰）

葉樹源（一九一五—一九九七）

財政部福建區國稅管理局局長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逢甲大學教授

葉樹源，別號伊泌，福建省福州人，生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二月十六日。父親葉伯奮，早年留學日本攻讀經濟學，母親是沈葆楨的孫女，父母親皆薄己而厚人，為鄰里稱頌。葉樹源兩歲時隨父母遷居北平，啓蒙於家塾，初讀於孔教會小學，繼續於師大附中，均在北平。一九三四年考取國立中央大學工學院建築系。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隨學校遷往重慶，一九三八年大學畢業，以國難方殷不宜遊學，乃罷出國之行而就業。

葉樹源自中央大學工學院建築系畢業，即到基泰工程司擔任建築設計之職。一九四〇年二月改至中國農民銀行總行擔任專員，主辦中國農民銀行之新建工程。一九四一年四月辭去中國農民銀行之職務，成立葉樹源

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業務，並任南京市建築師公會理事。

葉樹源於中國農民銀行總行時所主辦之新建工程，成績斐然，頗受矚目。一九四一年八月遂再被延攬入糧食部擔任專員兼工程審核。一九四八年五月調任糧食部倉庫工程處正工程師，主持建倉計畫。一九四九年四月再奉派任財政部福建區國稅管理局局長，此乃一生中唯一從事非所學之業務。葉氏自覺外行，更加兢兢業業，謹慎從事，而深蒙福建地方父老稱許。一九四九年八月任所淪陷，身在職守變起倉促，撤退不及，幸得鄉人協助，方能輾轉偷渡至白青島（今馬祖），等候入境證，於一九五〇年抵台，即將淪陷前後之稅務情形報呈財政部。

葉樹源來台之後，即開業執行建築師業務，曾先後設計「衛理堂」、「台灣銀行」、「成功賓館」、「華光大飯店」等建築物。並曾任台灣省建築技師公會監事、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理事等職。一九五一年八月受聘於台灣省立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擔任副教授，一九五五年二月升任教授。由於當時師資較為缺乏，葉氏以他豐富的建築學養，以及參與政府公共工程興建之經歷，除開授「建築設計」、「西洋建築史」等課程之外，還教授「建築材料」、「施工及估價」等建築實務課程。而後學校師資逐漸增加，葉氏遂以「建築設計」、「西洋建築史」等為主要講授課程。一九六八年八月，國立成功

大學建築系成立研究所碩士班，葉氏亦以其多年之建築哲理，於研究所開授「建築理論」課程。此期間亦受聘於逢甲大學擔任「建築設計」課之兼任教授。一九八五年八月葉氏因屆退休年齡，才在學生依依不捨之情下辦理退休。同年九月學校有鑑於葉氏在建築設計方面踏實的教學方式，對學生培養紮實的設計能力有潛移默化的學習效果，破例以超鐘點之方式再禮聘葉樹源教授為兼任教授，講授建築設計課程。此後每周建築設計課成為葉氏最盼望的日子。

葉樹源一生中最重要的講授課程「建築設計」課，亦是學生最感念的日子。葉氏於批閱學生建築設計作業時，係以慣用之六B鉛筆，逐一親手耐心解說修改，往往無法於課堂內時間完成，而必須利用夜晚幫學生改圖。酷熱的夜晚，常見葉樹源教授在老舊的木造宿舍裡，頂著微弱的燈光，桌下點著蚊香，身著汗衫，一手持扇一手持筆，繼續揮汗改圖之身影，恍如昨夜歷歷清晰在目；尤以深冬的寒夜，從木造隔牆縫吹進刺骨寒風，葉教授仍數十年如一日般的埋首改圖，並且親手熬煮「葉老湯」供學生食用，更令學生難以忘懷。

葉樹源早期於成大建材研究中心，曾著有《塑合板之研究》、《台灣大理石之研究》等之研究報告；於《今日建築》雙月刊第二期發表〈從意境到實境〉及《成功大學學報》第十一卷發表〈從「陋室銘」看我國古

人的建築觀》兩篇建築專文；積其多年講授西洋建築史之經驗，著有《西洋建築史》；一九八三年元月，並將平日對建築理論的見解彙整於《建築與哲學觀》一書，堪稱葉教授終生奉獻於建築界中智慧的結晶。近年，兩岸建築交流，大陸東南大學（原中央大學）建築系主任蒞成大建築系訪問，並攜回葉氏親筆題之《建築與哲學觀》一書，深受大陸建築業的重視，經徵得葉教授首肯於大陸出版，一時洛陽紙貴，爭相頒研。

葉樹源一生，忠愛國家，奉獻心力於教育界、建築界，奉獻心血於成大建築系，一九九七年元月九日逝世，所有學生不僅感受到葉教授中國文人之風骨氣節，更常沐浴於溫馨諄諄的教誨中，終身感念不忘。（黃祖權撰）

金世鼎（一九〇四—一九九四）

最高法院推事兼書記官長
司法院第二、三屆大法官

朝陽·中大·台大教授

東吳大學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法學院長
金世鼎字諾九，聖名安德，江蘇淮安人，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因肺炎在台北逝世，享壽九十一歲。

金家是江蘇淮安望族，世代書香，他的父親金幹森，學問很好，在他鄉做官，死於

任所。母親姓王是名門閨女，在他週歲時即逝世，因幼年喪母，所以養成了自立自強的性格。

小時候比一般兒童聰明，讀書成績一直是同輩中的翹楚，年長以後考入江蘇省立第九中學，九中就是以後的淮安中學，在江蘇是頗有名氣的學校。高中畢業後，考取國立中央大學法律系，由於在校成績優異，畢業後參加國民政府第一屆高等文官考試，獲司法官考試及格，入法官訓練所受第二屆法官養成教育，於一九三三年夏結業，派任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

當時政府銳意革新司法，遴選具有深厚法學基礎的優秀司法官赴美研究，他因為在法官訓練所表現特別好，一九三三年秋獲選到法國研究。先後在巴黎大學專攻羅馬法、民法，一九四〇年得到法學博士學位。正逢我國對日本抗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交通受阻，不能返國，只好留在法國繼續研究，計滯留法國十二年，該國也飽受戰爭破壞，致生活十分艱苦。

一九四五年我對日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他由法國返回重慶，被司法行政部派為簡任專門委員。政府還都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待審的漢奸案件特別多，當時的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知道金世鼎精明幹練，個性耿介，任命他為首都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庭長。他主審漢奸案件，嚴而不苛，凡遇案情不明朗的，總是抽絲剝繭，追根究底，力求發現事實

的真象，達到無枉無縱的目的，於是聲名遠播，樹立了他為人敬佩的公正廉明的辦案態度。

一九四九年國內大局逆轉，奉命負責最高法院疏散工作，歷經許多艱險後來到台灣，任最高法院推事兼書記官長，襄助院長處理行政事務，創建最高法院保密分案制度，在案件未評議以前，除承辦人以外，他人無從知道何人為主辦法官，對於防止「關說」，維護審判獨立與司法尊嚴，有深遠的影響。

一九五七年經蔣介石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特任金世鼎為第二屆大法官，以後又連任第三屆大法官，對於憲法及法令的解釋，無不細心研究，作最適當的處理，有時也獨排眾議，擇善固執，深受司法界同仁的推崇。前司法行政部（現改為法務部）特禮聘他為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召集委員，與前最高法院院長錢國成共同主持民法研修工作，先後完成民法總則及親屬繼承篇的修正。

金世鼎在留學法國期間，曾用法文撰寫「司法官考銓制度之研究」及「中法刑事制度之比較研究」兩書，在巴黎出版，回國以後曾參與東方百科全書法律部分的撰寫，他所發表的論文，更散見各法學雜誌。

為了不負所學，先後執教於朝陽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等校。尤其輔仁大學仰慕他學識豐富，且具有行政經驗，特聘請他擔任法律系主任，連

任九年，先後分設法學、司法、財經法學各組，使法律系在輔仁大學成爲學生最多的學系。

對於法律系課程的調整，教學方法的改進，教授陣容的加強，都不遺餘力，所以系務蒸蒸日上。他又在一九八〇年創立法律學研究所，招收碩士班研究生，後來又增設博士班，奠定學術研究基礎，培植優秀法學人才，使輔仁大學法律系及法律研究所畢業校友，服務於法學界或其他各界，皆能博得好評與肯定，這都是他身教言教的收穫。

輔仁大學的法律系及研究所不僅是他開創，且對學校的校務匡助也多，因此學校禮聘他爲講座教授，以表示尊崇。晚年信奉天主教，更能以宗教精神教誨學生，師生系友都尊稱爲「金公公」，受愛戴的程度，可說是經師人師的典範。

平生爲人敬慎嚴正，襟懷開朗，待人寬厚誠摯，處事公正廉明，亮節高風，清操絕俗，深受大眾的敬仰。

他的身體素來很健康，早晨起來散步，有幾十年的習慣，一九九三年八月因眼疾住台大醫院開刀，後因大小便帶血，經內科診治後返家療養，至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因肺炎平安逝世。

金世鼎一九二五年與童彩雲女士結婚，有一女名金聲，一子名金斌，均留學美國，成家立業。夫人童彩雲曾任淮安女子高等小學校長，來台後在司法機關服務，以至退休

，不幸於一九九〇年早他四年逝世，使他十分悲痛。（王培堯撰）

吳廷琰（一九〇一—一九六七）

南越政府總理

越南總統兼國防部長

南越前總統吳廷琰於一九六七年死於一次陰謀性軍事政變，同時遭毒手的還有他的弟弟吳廷瑛；一個替他掌控情治系統的得力助手。吳氏兄弟遇刺死亡後，南越軍政情勢急轉直下，越共猖獗，戰火擴大，僅數年光景，南越卒告淪入共黨之手，美國人倉皇撤退，灰頭土臉。

吳廷琰自稱他的家族，起自西元十世紀，當時他的一位祖先領導越南人和入侵的中國軍隊作戰，趕走了中國人，當上越南統治者，從此成了越南的貴族階級。大約在二百年前，他的家族改信天主教，於一八七〇年一場反基督教暴亂，吳家幾乎全族被殺，僅少數人倖存，他的先祖是其中之一。

吳廷琰生於一九〇一年，自幼就讀教會學校，最初立志要做一名神父。由於他的一名兄弟說了一句話：「教會太世俗化了」，使他改變主意，不再當神父，但發誓抱獨身主義。在法國殖民越南時代，因他的基督教背景，頗受法國人信任，而於殖民地政府做官，一九二九年升爲省長，一九三三年擔任內政部長，但他不甘做法國人的傀儡，僅數

月即告辭職，抗議法國人干政。

以後的十多年，吳廷琰過的是隱居生活，一九四二年日本軍侵入越南，一九四四年要他出任傀儡總理，爲他堅拒。一九四六年，越共頭子胡志明邀他參加河內臨時政府，他也沒有答應，一九四九年保大組織南越政府，請他出任內閣總統，也遭他拒絕。次年，他離開越南，先後住在日本、紐約及比利時的修道院，直到一九五四年由法國人力勸，他才回到越南擔任南越總理，和北越的胡志明分庭抗禮。

吳廷琰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愛國者，他不喜歡西方資本主義的腐化，也不喜歡共產黨的教條，希望越南自由化。他讀書甚多，學識淵博，造成頑固的個性，自我意識堅定，任何人很難改變他的心意和看法，連協助他抗共的美國人也很難說得動他。美國高級官員說他是「頑固的小傻瓜」。

吳廷琰回國任總理後，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理論，到了一九六二年，他已掌控一切大權，他是總統兼國防部長，其弟吳廷瑛是政治顧問，情治首腦，並爲他的代言人。另一弟吳廷環爲南越北部總督。其兄吳廷俶爲南越大主教，是兩百萬南越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另一兄弟吳廷倫爲駐倫敦大使。吳廷瑛的岳父陳文章是駐華盛頓大使，陳文章夫人爲駐聯合國觀察員。陳文章的女兒吳廷瑛的妻子則是南越第一夫人，爲南越婦女團結運動的主導人物。身爲南越總統的吳廷琰，只

相信自己的家人。他家族以外的人而握有實權的只有總統秘書兼國防部特別助理阮廷常。

吳廷琰喜歡炫耀，他常邀駐越美國高官或外交使節參加一些小型慶典，例如學校開學之類，這些典禮通常在早晨七點半開始，客人常被邀早到半小時，並規定穿一種已成爲制服式的白禮服。當內閣，最高法院院長，國民大會議長，及副總統，最後吳廷琰本人，相繼互隔五分鐘抵達時，全場必須很尊敬地起立，而且他們在抵達時，一次一次都有軍樂吹奏，賓客則在烈日下汗流浹背。隨後便是永無止境的越南話演講，幾乎沒有外國人聽得懂。有一次吳廷琰夫人發表一篇激烈的講演，不斷侮辱美國，而在場的美國高級人員一字不懂，當她講演完畢時，還報以禮貌的鼓掌。

吳廷琰不喜歡閱兵，連每年十月廿六日的國慶日也從不做軍事檢閱。一九六一年，美國人耗資七百萬美元爲他建立了一座無線電廣播電台，希望他常常演講，啓發南越人民仇視共產黨的民族精神。但他很少使用，他對親近人員說：「保大發表了很多演講，他的結果如何？」

在由美國人製作，向全國放映的新聞紀錄片中，吳廷琰發表談話，卻不喜歡自己攝入影片中。但他常常下鄉，很隨便地和農民閒談。

在一九六二年，他下鄉，當他問起某種

害蟲時，人們告訴他這一地區已受到災害。他立即走下泥田，用手在一株植物根部附近挖動，翻出幾頭害蟲，然後他又和一位抱著赤裸身體的孩子的農婦冗長地討論這一問題。這本來是一極佳的新聞片鏡頭，但攝影人員是不准隨行的，他認爲這類宣傳會有損尊嚴。

吳廷琰認爲，民眾的支持政府是理所當然的。當越共竭力向農民宣傳，保證爲他們服務時，吳廷琰和吳廷琰卻不斷地強調人民對政府的「義務」，他們的政策是，政府只給予人民需要的東西。他不贊成美國顧問在鄉下將糖果分給鄉村的孩子的行爲。他的政策在道德上含有一種清教徒的意識。對於美國人重視鄉村政績的建議，他一再拒絕接受。

爲了加強剿共，吳氏兄弟全面推行「戰略村」計劃，這一計畫是由來自台灣的中國軍事顧問策訂的，含有「戰鬥」及「計劃」雙重意義，藉由鞏固農村，使共黨無地可容。鄉村中的農民除藉戰略村自保外，還可藉此增加生產。

實施之後，頗有成效。事實上，南越人民大多不懂空洞的共黨理論，他們只想改善生活條件，所以他們最痛恨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地方上的貪官污吏。吳廷琰忽略了這一點，以致「戰略村」功敗垂成。

戰略村的失敗，敲響了吳廷琰政權的喪鐘，最後卒在軍人的不滿和抗拒之下，於一

場血腥的軍事政變中，吳氏兄弟雙雙被殺，他的政權也隨之煙消雲散。（劉先軍撰）

馬可仕 (一九二五—一九八九)

律師、參議員

菲律賓總統

前菲律賓總統馬可仕鐵腕統治菲律賓長達廿年，本來是位頗孚人望的政治領袖。可惜當政後期，逐漸獨裁，導致政治動盪，經濟衰落，引起民怨，卒於一九八六年被逐下台，自我放逐美國夏威夷。在馬可仕下台時，健康已走下坡，出走夏威夷後一年餘，即告病逝。死後的馬可仕，其夫人伊美黛曾欲將其遺體運回菲律賓，但當政的艾奎諾夫人柯拉蓉堅決拒絕，直到柯拉蓉總統任期屆滿，羅慕斯當了總統，才批准馬可仕遺體歸葬，總算結束了流亡生涯。

馬可仕出身菲律賓第一大島呂宋島北部，爲菲律賓四大政治家族的一員。號稱戰後民主制度最完善的菲律賓，採用美式民主，全盤照搬。可能是水土不服，這套民主制度卻使菲國政治逐漸淪入四大家族輪替，形成貴族民主政治。從地方到中央，四大家族幾乎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資源和大部分財富，而非律賓一般平民日益窮困，貧富懸殊，造成菲律賓的政治動盪，使菲律賓從最進步的國家淪爲貧窮落後國家。

由於馬可仕出身「貴族」，所以他和遇

刺身死的前參議員艾奎諾（柯拉蓉之夫）及現任總統羅慕斯都有親戚關係，為遠房表親。軍人出身的羅慕斯由軍中一路攀升，位至四星上將，馬可仕提攜之功，歷歷在目。故而羅慕斯對馬可仕沒有怨恨，其遭體落葉歸根及馬氏遺孀伊美黛特准回國，均水到渠成。伊美黛回國後高票當選參議員，雖面臨貪污罪而被判處二十年重刑，但伊美黛並不在牢內，而活躍在馬尼拉政壇，這就是菲律賓的民主「特色」。

馬可仕跟柯拉蓉一樣都有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他們的祖母輩都是當地華僑，所以馬可仕多次表示以其華人血統為榮。這當然是選舉時向華僑拉票的招數，不過馬可仕當政時，的確沒有歧視過華僑。

馬可仕自幼聰慧，活潑好動，畢業於馬尼拉大學。大戰前，廿二歲的他已是地方知名的律師。就在這一年，他的父親老馬可仕競選議員失敗，不久，政治對手即遭暗殺。孩兒臉的馬可仕涉及該案，被判刑十七年四個月，但他自我辯護成功，無罪開釋。

一九四一年日軍入侵菲律賓，馬可仕任陸軍中尉，率部反抗日軍，在戰鬥中至少兩次負傷，還被日軍俘虜兩次，關在令抗日志士聞名喪膽的聖地牙哥監獄，備受酷刑，但馬可仕均能設法逃出，顯露了他的機智和勇敢。另外，他在自傳中自稱曾領導過一支抗日游擊隊，但美軍遠東總部卻說查不出這支

游擊隊的檔案。

戰後的一九四九年，馬可仕以戰鬥英雄的姿態在家鄉競選國會議員，他告訴支持者說，你們選出的不止是一位參議員，還是未來的總統，果然，馬可仕參議員於十五年後的一九六五年，當選了菲律賓總統。

在馬可仕從政期間，他的妻子伊美黛始終是他最忠貞的支持者和追隨者。伊美黛是選美皇后，貌美不在話下。據說，當年伊美黛想嫁的對象不是馬可仕，而是英俊挺拔，才華橫溢，又富可敵國的另一青年參議員艾奎諾，但艾奎諾認為伊美黛空有美貌而無頭腦，把愛的箭頭轉向清雅秀慧的柯拉蓉，伊美黛失望之餘，閃電嫁給了馬可仕。當時，馬可仕在家鄉還有原配，花了好大一番功夫，馬可仕才摒棄了糟糠。

伊美黛在政治上也有野心，她協助馬可仕一步步的爬上最高峰，她自己也成了馬坎南宮的女主人。在總統生涯中，馬可仕一直和美國結盟，曾派兵赴越南助戰，和東南亞反共國家加強關係，結成反共聯盟。他曾多次向台灣取經，例如仿倣台灣的「耕者有其田」政策，進行土地改革，仿倣蔣中正以憲法增訂條文延長他的總統任期等等。不過他的工改政策，不像台灣一樣的落實全民，僅部分人獲益，招致反對派的抨擊和批評。當然也有相當的支持者，馬可仕錯估民眾支持的力量，對反對派鐵腕鎮壓，遂導致菲律賓動盪不安，示威頻頻，經濟發展停滯，國勢

一蹶不振。

但是真正導致馬可仕垮台的，卻是一九八三年艾奎諾遇刺身亡。參議員艾奎諾是馬可仕最頭痛的反對者和批評者，因逃避馬可仕報復，流放美國五年後自動回國，艾奎諾由美經台北坐華航班機返回馬尼拉，不料才下飛機即遭人暗殺，橫屍機場。立即引起政治風暴，國內國外強大的政治齊集馬可仕身上。其實艾奎諾被殺時，馬可仕曾染病在床，在醫院施行腎臟手術。他是否知情，迄今是謎，後來他也被起訴。不過，他的親信參謀總長維爾涉案，使他染上洗不清的嫌疑，世界人權組織對他大加譴伐，責他濫施權力。案發後的一個文人調查委員會也說軍方是主謀，但主理該案的特別法庭卻說軍方未涉案，儘管如此，馬可仕仍成了箭靶，被指為殘暴獨裁人物。

美國總統雷根原訂那時訪問菲律賓，也因艾奎諾事件取消。美國政府疏遠了馬可仕，宣稱菲律賓的前途繫於其能否革新其民主程序。

在美國壓力下，馬可仕被迫提前舉行總統大選，於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舉行，比預定任期提早了一年多。艾奎諾的遺孀以哀兵姿態成了反對派的總統候選人，結果還是馬可仕獲勝，但被指為舞弊，政潮反而擴大，到處有大規模的示威。最後在美國的脅迫下，馬可仕交出政權，讓位給柯拉蓉，流亡夏威夷，結束了長達廿年「強人政治」，最後

病死在美國夏威夷。(汪清澄撰)

劉應昌 (一九一九—一九九五)

台灣省工礦公司營建處工務組長
東海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

劉應昌福建省林森縣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在台北病逝，享年七十六歲。

父親劉弼亮，曾任福建平潭、連江等縣縣長。祖父劉通字伯瀛，早年追隨孫中山獻身革命，領導福州起義，光復福建，一九二〇年到廣州參加護法之役。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時，任大理院庭長，兼代院長職務。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後，任福建省最高法院院長，一九三四年到南京任立法委員。對日本抗戰時期，隨立法院遷重慶，曾任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委員長，勝利還都後，當選為行憲首屆立法委員。

劉伯瀛對儒學很有研究，尤其是易經，著有「中庸之道」一書，多次擔任報社編輯，在服官之餘，常為報社撰寫時論。他又擅長中醫，曾創辦福建中醫學校，倡中醫新制教育的先河。

劉應昌早年母親去世，父親又在外鄉做官，所以常受祖父母教導，從小就熟讀經書，講求孔孟學說，以強國富民為自己的責任。養成生活規律，讀書勤奮的習慣，弟妹有

疾病時，則細心照料呵護。進入學校以後，常邀同學返家，研習功課，遇同學有困難，慷慨解囊，把同學視同家人般。

啓蒙後進福州格致小學，因成績優異，保送格致中學，畢業時名列前茅。一九四〇年通過各大學在戰區招生聯考，進入國立中央大學建築系，他從福建北部經江西西南部、湖南、廣西、貴州進入四川，一路上吃了許多苦頭。

一九四四年對日抗戰局勢緊張，全國青年熱烈響應從軍號召，當時他已大學四年級，奉召擔任軍事翻譯官，被調派到成都空軍基地，協助來華作戰美軍。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夕，除役返校完成學業。然後在重慶衛生署、中央衛生實驗院工作，第二年隨政府還都南京。

劉應昌在校時品學兼優，做事踏實，對國是也很關心，遇有知己，發表他的卓見，因文學修養頗深，偶有詩作，也超然脫俗。在南京中央衛生實驗院任職時，與同學吳良鏞共同為善後救濟總署編著：「醫院建築設計手冊」，並訂定中小型醫院建築規範，另又主持南京中央醫院的修復工程，設計改建，嚴格監督營造，這是他從事建築事業的開始。

一九四七年八月與鮑亦俊女士結婚，他們原就相識，婚後來台灣，任台灣省建設廳公共工程局「幫工程司」，參與省政府圓山招待所的工程設計與監造，一九四九年六月

完工，即現在圓山大飯店的九龍廳。一九五〇年春，轉任台灣省工礦公司營建處工務組長，負責建造蔣介石總統的士林官邸。

一九五三年冬季，他因在南京常與民盟人士接近，來台灣以後被羅織入獄，在監禁期間，以工作需要，不久即編入工程隊常服外勤，在這一段時間常教難友國學及建築學，又從難友處學習日語，於是他於國語、閩語、閩南語、客家語及英語之外，又能說日語。

一九五八年出獄後，協助友人從事建築業務。一九六二年兼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後轉任淡江大學建築系兼任教授，教授中國建築史。又加入陳其寬同學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更加繁忙。

一九七二年他另創樂成建築師事務所，一九九一年又組成陳其寬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長，至一九九五年病逝，先後獻身建築事業近五十年之久。

他與陳其寬建築師合作期間，曾參與政府、學校、工業、運動及商業等各項建築的設計與監造。較大的有：曼谷亞洲理工學院、桃園中央警官學校、林口國立華僑大學、國立中央大學校舍、國立屏東技術學院圖書館、運動場；台北松山機場、桃園怡聯公司埔心貨櫃集散中心、新竹科學園區行政大樓及美國電話公司廠房、新竹縣政府辦公大樓、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北棟）、嘉義市運動公園暨體育館、台北彰化銀行總行、台

開公司仰德大樓及信託大樓、高雄區漁會漁業大樓、嘉義市西市場重建多目標使用大樓等。

一九五二年他的夫人鮑亦俊與他個性不合而離婚，此後即未再娶，與女兒孟穎、女婿王強共居，外孫浩略在美國讀大學，義子劉震邦，媳王婉蓉也常侍左右，義孫劉著文，年幼好學，常被譽為「博士」。

他在就業之初，在四川北碚花墩宿舍，曾向祖父請訓，他祖父教他：「取與之間，宜有分際」，太史公說的「臨財廉，取與義也」，他一生奉行不渝，嚴以律己，寬厚待人，在朋友間是大家都欽佩的。（王成聖撰）

吳允周（一九〇一—一九九六）

中央軍校七分校教育處長

陸軍一九一師師長

陸軍騎三軍代軍長

陸軍軍官學校西安督訓處中將處長

陸軍軍官學校中將教育長

吳允周，原名洪春，譜名望春，別號雲舟民前十一（一九〇一）年生，祖籍浙江東陽，兄妹三人，入東陽中學，畢業後入浙江之江大學預科，時革命風氣高漲，即潛赴廣東投考黃埔軍校三期步科，民十四年畢業時任官奉改名為允周，民十五年參加部隊，歷任排連營長，二十一年入陸大正則班十期，

二十四年畢業，即加入第一師，為胡宗南將軍之得力助手，歷任團長，師參謀長，參加剿共與抗日諸戰役，貢獻良多。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參加淞滬戰役，並隨軍轉戰於津浦、隴海鐵路沿線，行軍途中並奉命收容有志抗日優秀青年達數千人，於民國二十七年，奉中央之命令，成立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擔任教育處長兼辦公室主任，隨將有志抗日優秀學子，編成軍校十五期及其他班隊，實施軍事教育，數年辛勞，終底於成。尤以七分校時期，由鳳翔的草創，到王曲的慘淡經營，使淪陷區的青年，前仆後繼來歸者不絕於途，延安的抗大為之失色。

鼎盛時期的十六、十七兩期，學生總隊各為七個總隊，學區橫跨渭水兩岸，師資人才薈萃，訓練設施齊備，七分校矗立於西北的王曲，遂而名聞遐邇，美，魏德邁將軍讚譽堪與海外任何軍事學校相媲美；成都本校教育長親率八個分校主任，前來考察訪問。吳氏肩負教育重責，辛勤耕耘，默默奉獻，為抗敵禦侮厚植戰力，耗盡心力。民俗大家朱介凡在其「悼允老，念王曲」一文中，譽云「以鳳翔創校元老，貫徹始終，伴著七分校走入歷史」，正是對他與七分校最佳的寫照，吳允周臨終之前，猶叮囑子女以二十五萬元之巨款，捐獻「王曲文獻會」，足見其對七分校之情重義深，堪為典範。二十九年，調任一九一師師長，進駐甘肅、鎮懾陝北及河西，旋因綏遠西部友軍遭叛軍圍困，吳允周

於艱苦卓絕之環境中，奉命後千里馳援，卒以計劃得當，指揮適宜，能圓滿完成任務，在其解圍後，回駐寧夏省中衛縣，未屆三月，又移駐固原、西峰等地區，與回民相赴，闔閭不驚，軍民之間，極為融洽，並成功封鎖共軍之竄擾，民國三十一年，調升騎兵第三軍副軍長並代理軍長，駐守秦隴戰略要點，為戰區總預備隊，鞏固後方，支援前線，功不可沒。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翌年元月，第七分校改為陸軍軍官學校西安督訓處，由吳允周任處長，在西安之二十一期步兵七八九十大隊，騎砲工通輜特科大隊學生共三千人，實施學年教育至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十八日畢業分發，大功告成，並率領二十一期步十一大隊及工通中隊一千餘人，由西安行軍至成都本校，實施合併訓練，沿途顧慮周詳，未發生任何事故，由西安至本校後為本校教育處長，關麟徵卅六年秋升任校長，吳允周晉任教育長，此時在校學生二十一期、二十三期，均為其指導計劃訓練下之學子，如在台之現任參謀總長羅本立上將，前副部長汪多志上將，前陸軍總司令黃幸強上將均其一手培育之學生。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共軍圍攻成都，大局危如懸卵，蔣中正總裁駐節成都軍校校本部，此時叛軍四起，吳允周負責警衛任務，外圍由軍校練習團、示範營士兵擔任，內圍由二十二、二十三期學生負責，使蔣中正總

裁在間不容髮之危境中，安全離開成都，吳允周忠貞不二之品德終於完成使命。

成都最為危急之時，吳允周曾建言遷校台灣鳳山之議，因客觀環境，未蒙採納，後中樞決遷往西昌，吳允周奉命乘最後一架軍機自海口轉到台灣，蔣中正總統器重吳允周作戰訓練之長才，指令參加國防大學聯戰系及革命實踐研究院等高級學府接受教育以優異成績畢業，因在台全面軍事無任何發展，吳允周報國有志請纓無門。

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吳氏調國防部中將參議，四十年六月，任國防部高參，五十三年一月台灣銀行聘任為顧問。七十六年春，捐款六萬元，號召王曲師生，「以憂患之共識，同舟一命之心情，共同來寫一套有血有淚，而具歷史性、公共性作品」，發起籌組「王曲文獻會」，至八十四年一月，已先後出版「第七分校校史」、「師生專集」、「胡宗南上將專集」、「抗日戰史」、「戡亂戰史」等五部王曲師生血淚巨著。另於七十八年十月，發行「王曲通訊」季刊，吳氏為發行人。

吳允周德配陳安卿，生子女五人，長男子平畢業廈門大學，來台後在中國造船廠工作三十餘年，現已退休，次男北寧陸官二十三期砲兵科畢業，三男金昂畢業於行政專校，四男平生、河北鋼鐵學院畢業，長女亞蘭、台北護專畢業、陳氏歿後，由胡宗南長官撮合，續娶馬培蓉為繼室，馬培蓉係河南大

學醫學院畢業，系出名門，對陳氏所生子女均視為己出，盛稱賢淑，又育三男一女、五男北玄、美北達柯達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六男兆龍、七男兆麟，皆畢業於東吳大學，幼女亞莉，因患腦炎，致成聾啞，殊堪憐惜。

吳允周攝生有方，三餐食不過飽，不沾煙酒及刺激之飲料，每日做適當之運動，一生極為健康，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因肝病併發去世，享年九十有六歲，一代名將，福壽全歸。（王健、紀福和撰）

張伯苓（一八七六一一九五二）

南開大學校長
國民參政會副議長
考試院院長

民初名教育家張伯苓，原名壽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終生獻身教育。胡適很佩服他，曾在一九四六年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慶祝張伯苓七十壽辰出版的專書中，用英文寫了一篇「張伯苓傳」(Chang Po-ling: Educator)。此文於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台北的民族晚報曾予譯載。文中，胡適引用張伯苓的自述：「我既無天才，又無特長，我終身努力小小的成就，無非因為我對教育有信仰有興趣而已。」胡適還引用了張伯苓的一位朝鮮朋友對張伯苓的評語：「張伯苓是個極其簡單的人，不能跟同一時代的傑出人物爭一日之長短，但是他腳踏實地的苦幹，在他

的工作範圍內，成就非凡」。

張氏畢生的成就在教育，他創辦南開小學、中學、大學，自一九〇三年開始，初期只有學生五人，到了一九三六年，他六十歲時，南開中學小學已有學生三千人，是國內首屈一指的中學。後來又開辦南開大學，成為華北著名的學術重鎮，一路走來，全是由無到有，白手起家。

張伯苓一八七六年四月五日生於天津，其父多才多藝，愛好音樂及騎馬射箭，由於太沉迷於遊樂，不事生產，以致家產蕩盡。續娶的妻子生張伯苓時，已是家徒四壁，靠教館授徒維生，勉強自給。由於痛悔自己不能振作，便把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要使其受良好教育，嚴格的修身。

張氏七歲入私塾讀經，由於父親管教嚴格，讀經成績優異。十三歲考進北洋水師學堂，學習海軍，北洋水師學堂由留英學者嚴修（範孫）、伍光建等人主持，以英人的管教方式教學，注重理論與實作；張氏苦練勤學，每次考試皆名列前茅。教師中有蘇格蘭人麥克禮，講解精闢，更以品格陶冶學生，使學生受益匪淺。麥氏對學術科都很優的張伯苓印象深刻，獎勵有嘉。張氏於一八九四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年才十八歲。

次年甲午（一八九五）中日海軍首次在黃海大戰，中國海軍全軍覆沒，使張伯苓等海校畢業生連個實習船都沒有，被迫回家靜候，等了一年，才獲准登上上海軍實習艦通濟

號當見習軍官。張氏在通濟艦上實習三年，目睹旅大威海衛諸港，相繼被列強瓜分。連申國恥，使他深感國勢岌岌，堅甲利兵已不足以挽救危亡，於是決心脫離海軍，創辦新式教育，扭轉人心，強化國勢。

甲午戰敗於日本後，中國衰頹畢露，歐洲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競相爭奪勢力範圍，張氏即當時在威海衛親身經歷到中國所受的恥辱，威海衛原為中國海軍軍港，中日之戰後，被日軍佔領，旋由三國干涉交還中國，轉租於英。通濟號奉命開往威海衛自日軍方面接收，於翌日移交英軍，張氏目擊心傷，喟然嘆說：「我在那裡親見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次，又取下了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我有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張伯苓的這種覺悟，反映出當時瀰漫全國的革新風潮，戊戌政變代表了革新運動的最高潮，可惜革新運動不敵慈禧太后的守舊勢力，而以六君子人頭落地告終。張氏時年廿二歲，內心沉痛萬分。

一八九九年（光緒廿五年）張伯苓在天津應水師學堂老師嚴修之聘教導其子姪五人，授以數理化等科，取名「嚴館」。一九〇一年天津士紳王奎章也聘張伯苓教其子弟六人，名叫「王館」，張氏每天分上下午兩地教授學子，是為他從事教育之始。

嚴修和張伯苓亦師亦友，對他的影響很大。嚴修在清末為北方學術界重鎮，提倡新思潮新學說，不遺餘力，而且德高望重，極受天津人的景仰，張氏得嚴修贊助，為南開奠定始基。在嚴、王兩館，張伯苓教授法已極新穎，堪稱為現代教育的典範。所授課程有英文、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基本學識，尤注重學生的體育。他與學生混在一起共同作戶外運動，如騎腳踏車、跳高、跳遠和足球之類。同時注重科學和體育，師生共同學習，共同遊戲，張氏的教法實為中國現代教育的第一人。一九〇三年四月，嚴修邀他同赴日本，考察大中小學教育制度，歷時四月餘，於八月底回國，帶回許多科學教育儀器。兩人對日本教育發達、科學進步，深受啓發。

回國後，嚴修捐出自宅偏院部分房產，把私塾改名為中學，稱為天津第一私立中學，於一九〇四年開學，有學生七十四人，每月教育經費紋銀兩百兩，由嚴張兩人平均負擔。一九〇六年，他們的一位殷富的朋友鄭菊如捐贈天津近郊南開水閘旁的空地十餘畝，供學校新建校舍，校舍於次年完成，遷入後，改名為南開中學，由張伯苓擔任校長，為「南開」定名之始。

一九〇九年張伯苓赴歐美，考察各地教育制度，回國後，引進歐美教學方式。這時候，基督教青年會在華北十分活躍，青年會的幾位美籍幹事，和張伯苓極熟，他到歐美參觀教育及社會狀況後，對基督教逐漸嚮往

，乃於一九〇九年秋受洗為基督徒。

一九一一年，民國肇建，推行新學制，南開中學成立較早，發展迅速。一九一五年，應畢業生要求增設英文專修科，次年又設專門部和商業科及師範科。卒因師資難求，經費困難，於一年後停辦，但他創辦大學的意志始終堅定不移。一九一七年，張伯苓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教育，校務由其弟張彭春代理。他在美除研究師範教育學術外，留心考察美國大學教育，作為創辦大學的參考。一九二〇年，天津籍的江蘇督軍李純自殺身亡，留下遺囑，指定他的部分財產約值五十萬元作為南開辦學經費；中美文教基金會和中庚庚子賠款基金會，也以英美退還的賠款一部份撥捐南開。紐約洛克斐爾基金會更捐助大宗款項，建造南開大學校舍及其他設備，並資助該校的經濟研究所。

南開開辦之初，基地不過兩畝，不到幾年，即在附近添購一百畝以上，以供擴充。南開大學係於一九一九年正式開學，設文、理、商三科，翌年增設礦科。經濟研究所於一九三一年設立。次年又增設化學研究所，南開中學女子部則係於一九二三年設立，並於一九二八年設立實驗小學，到了一九三二年，南開已完成了五個部門，即大學部、研究院、男子中學、女子中學，及小學。在毀於日軍炮火的前幾年，學生總數已達三千人。此時，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因張氏辦學有

成，授給他榮譽博士學位。

南開校務蒸蒸日上，歸功於張伯苓的領導，殆無疑義。他常對友人說，一個教育機關應當常欠債。任何學校的經費，如在年終，銀行裡還有存款，那就是守財奴，失去了用錢做事的機會。他開辦學校可說是白手起家，他不怕支出超過預算。他常常不停的籌謀發展的新計劃，不因缺少經費而阻斷他謀發展的美夢。他對學校前途是樂觀的，也是進取的。他常說「船到橋頭自然直」。結果確是常常有人幫助他實行新計劃。張伯苓曾經指出，中國的主要缺點是國弱民窮，迷信自私，缺乏科學知識和公德心，不能團結。總之有「愚、弱、貧、散、私」五大缺點。他提議執行五點教育改革計畫，以糾正此類民族缺點：一、養成健全體魄，增進人民健康；二、訓練青年認知現代科學方法及成就；三、組織學生發揚合作精神參加團體活動；四、給予學生德育訓練；五、導引學生為國服務，使人人願為國宣勞。

張伯苓的辦學理念，受華北基督教青年會的影響甚深，早在他就讀水師學堂期間，就和青年會的美籍幹事李昂 (D. Willard Lyon) 於一八九五年在天津組織了第一所青年會。後來張伯苓在嚴館執教，又與青年會美籍幹事多人認識，其中兩人是著名的運動家，當時均在華北工作。一位名叫蓋萊 (Robert Galley)，是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為全美橄欖球中鋒，另一位叫羅勃生 (C. H. Robertson)，是普渡大學畢業生，為跳高高手。

羅勃生在天津每週主持一次查經班，對於張伯苓皈依基督教具有直接影響。張氏和這些青年會籍人士 (還包括約翰·海賽之父拉斯可·海賽 Roscoe M. Hersey) 往還，曾於一九〇八年到國外實際觀察教會主持的社會活動，他逐漸對基督教發生興趣，於一九〇九年受洗，是當時加入基督教的極少數中國知識份子之一。由於這種關係，張伯苓不久即以提倡體育運動馳名全國。一九〇九年在他的協助之下，第一屆華北運動會在南開中學舉行。基督教全國青年會總會在張氏敦促之下，於一九一〇年十月配合全國工業展覽會，發起舉辦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張氏以倡導運動的仁俠精神著稱，以後地區性及全國性競賽，一直均請他主持。南開學校無論團體或個人，在非教會學校中，各種運動比賽往往獲得冠軍。張氏特別教導學生注重運動道德，恪守團體紀律和共同合作。

一九三二年華北運動會在天津舉行，南開中學及大學生數百人，著有色制度，在運動會看台上排演「收復失地」四字，觀眾大受激動。日本駐天津總領事認南開此種行為，在作「仇日」宣傳，提出抗議！張伯苓嚴詞表示：「中國人有愛國的自由，外人不得干預！」日領事雖無可如何，南開已被日本軍閥視為眼中釘。

張氏熱愛運動，他早在嚴修私塾中，即指導學生練習運動，用一椅架以毛帚，即為

跳高之練習；由一人曲身，一人躍過，即為木馬之練習。後來曾屢次充任遠東運動會的職員，全國代表領隊、全國華北等運動會的總裁及全國華北體聯會的常務委員，全國體育協會副主席兼任內政部華北水利委員會委員、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副董事長、太平洋問題調查會中國代表、河北省教育廳教育設計委員會高等教育委員、體育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此外，他還鼓勵南開學生演劇，早在一九〇九年，他就鼓勵學生演出現代話劇。張伯苓親自撰寫劇本，指導學生舞台表演。他不僅以校長身分擔任劇中主角，使外界觀之驚愕不置，認為有失體統。後來，他的胞弟張彭春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文學和戲劇歸國，接受他的指示，導演幾本新劇，公演成績可觀。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和「人民的公敵」，均由張伯苓導演，獲得一致的好評。

張伯苓辦學，重視學生道德修養和愛國情操，他以身作則，身兼教員。每星期三下午，必召集全校師生，共同討論人生問題，國家大事和國際關係。他幾乎叫出每一個學生的名字，不彈煩的對他們說教。

張氏一生熱心愛國，以教育救國為終身事業，他的教育學說可歸納為「公能」兩字，他以公能兩字為南開校訓。對於日本在東北的野心，常覺憂懼，一九二七年，他親自到東北去調查，回來後即在南開大學組織東北問題研究會，派遣教授數人赴東北考察，

爲日人所嫉視。七七事變後，平津淪陷，南開大學中學因爲平時愛國抗日的緣故，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九、卅兩天被日軍轟炸機炸毀。當時張伯苓校長在南京，蔣中正委員長聞訊，即安慰他說：「南開爲國家犧牲了，『有中國即有南開』。」

抗戰開始後，他的愛子張錫祜即投效空軍，南開被炸毀後不久，張錫祜駕轟炸機在前線作戰，不幸在江西山中失事喪生。張錫祜在失事前三年，畢業於航空學校，舉行畢業典禮時，張伯苓曾代表畢業生家長致詞，激勵學生奮勇殺敵。當他聽到他愛子的惡耗時，靜默一分鐘後說：「我這個兒子爲國犧牲，他已盡了他的責任了。」南開遭日軍毒手，早在他預料之中，一九三五年，他就到四川各地查勘適當的地址，作遷校之計，數個月後，他又派南開中學校務長到華西去考察是否有設立華西分校的可能，不久即決定在重慶近郊興建校舍，一九三六年的九月新校開學，名南渝中學，一九三八年，應南開同學會的建議，改稱爲南開重慶分校，南開大學則從教育部建議，與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合併，在長沙開學，校名聯合大學。一九三七年，長沙被敵機轟炸，聯大遷往昆明，校名改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抗戰期間，南開大學雖由政府津貼，但南開中學始終保持私立性質。抗戰勝利後，南開大學復校，仍由政府資助，但張伯苓始終主張教育應由私人辦理。而且畢生朝此目

標努力。張伯苓辦學成功，歸功於他的行政才能，他能夠聘到卓越的年輕學者，一經聘定即對人信賴有加。南開大學文學院有徐謨、蔣廷黻等人執教，成爲華北最好學院之一。天津爲重要的工業都市，爲了研究學術及服務社會，他在南開成立經濟研究所，由何廉、方顯廷等經濟學家指導，從事編纂物價指數，研究工廠情況，調查對外貿易統計數字。研究所逐漸被公認爲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機構，出版物馳名全球。在南開繼續發展與擴充之際，張伯苓不但能從中國政府及國內私人機構獲得財政支援，也能從國外教育及慈善團體，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機構獲得資助。一九三〇年代，南開擁有校地二百英畝，校舍建築雄偉壯觀，爲華北著名學府，校譽和北大、清華、輔仁諸校等量齊觀。

張氏對政治發展很注意，但不願做官，政府屢欲畀以要職，曾邀他出任教育部長及天津市長，均被婉謝，及至抗戰時期，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乃投身政治，一九三八年，國民參政會成立，張伯苓當選副議長，迭次出席會議，重要意見多在駐會委員會提出，他希望受教的學生都有政治的覺醒，但不一定人人都參政做官。

張氏大半生未加入任何政黨，在抗戰時才加入中國國民黨。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張氏爲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同年南開大學改爲國立，仍

任張伯苓爲校長，于十月在天津復校。翌年他鼓勵南開校友參加政治，在天津創立「公能學會」。一九四八年接受蔣中正總統的敦促，出任行憲後第一任考試院長。覆國民政府要員陳布雷電中有一段話說：「介公爲救國者，我爲愛國者，救國者之命，愛國者不敢亦不忍不從。」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張伯苓未曾逃出，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三日遭中共精神上之迫害，患腦溢血不治逝世天津，享年七十六歲。張伯苓平常不尚空談，說到做到。所以他注意實學的培养，無論教育與訓練，都是腳踏實地的做工夫。盡量發揮「學以致用」「身體力行」的精神。

張伯苓本來有吸香煙的嗜好，在一九一三年時，他發現一個吸煙的學生，手指薰黃，他覺得一個學生這樣嗜煙，極不應當，遂召學生到辦公室中，大加訓斥，學生指著校長辦公室棹上的香煙，加以反駁。他立將香煙丟入痰盂，從此不再吸煙，戒煙事情雖小，他竟表堅定不移的作風。

張伯苓辦學，經常對學生講話，語意誠摯，要言不繁。他的學生曾爲他輯錄一冊張伯苓箴言，茲摘錄箴言於後，作爲本文結尾：「南開精神就是長進和創造的精神」。「我們要關心政治，你不管政治，政治會來管你」。「一個人祇有到死的時候，才會腐化，活人是應該不腐化的」。「一個人要忠實於其生命，就必須能吸收新智識，發揮新思想，並能予以實行」。「不認識體育的人，不應該做學校校長」。（趙自齊撰）